

文化
中国
世界
CULTURE
CHINA
AND
THE
WORLD
新论

甘阳
主编

刘小枫 著

共和与经纶

甘 阳 主 编

文化：中国与世界新论

*

共和与经纶

熊十力《论六经》《正韩》辨正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
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共和与经纶:熊十力《论六经》《正韩》辨正 /
刘小枫著. 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2.1

(“文化: 中国与世界”新论)

ISBN 978-7-108-03843-2

I. ① 共… II. ① 刘… III. ① 熊十力 (1884~1968)
—经学—研究②熊十力 (1884~1968)—韩非子—研究
IV. ① B26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3670号

责任编辑 舒 炜

封面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张雅丽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
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9.875

字 数 140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册

定 价 28.00元

目 录

引言	1
一 走向新共和	11
二 发孔子微言	24
三 革命与唯识	46
四 革命与心性	74
五 有道与极权	104
六 心体与自由	142
七 圣人与独裁	171
八 天人共和国	208
九 颠覆天下篇	238
余绪	281
附记	303

引 言

1949年至1951年间，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，现代新儒家“开宗大师”熊十力先后刊印五篇文稿，依次为《十力语要初续》（1949，香港），由门人所记、熊十力亲手改定的弟子听讲笔记《韩非子评论》（1949，香港）和《摧惑显宗记》（1950，北京）两种，然后是两封长信：《与友人论张江陵》（1950，自印本）和《论六经》（1951，北京）——这些文稿如今收入《熊十力全集》第五卷。^{〔1〕}韩非子和张江陵皆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，前者教

〔1〕《熊十力全集》，肖蓬父主编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。《全集》按发表年代编辑，凡八卷，附加评论十力先生的文集一卷两册（一千余页）。凡引第五卷文献，仅随文注篇名和页码。

海如何施行政道，后者身体力行践行政道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熊十力以阐扬体用不二、明心见性名家，堪称典型的哲人。《韩非子评论》和《与友人论张江陵》却让我们看到，深究唯识、弘阐《大易》《春秋》微言的十力儒学，绝非空玩心性之学，而是有着深切的政治关怀——十力先生不仅是形而上学大家，也是政治思想大家。

要理解某个思想家，得先理解其所立之志——十力先生追随王阳明突出强调，个人立志是治学问道的基础。^{〔1〕}在《全集》第五卷中，《论六经》最引人注目，并非仅仅因为这封长函是写给新共和国领导人的。《论六经》也是十力对自己一生志向和思想的概括性自我阐述，尽管这次阐述同时是一次政治行动，毕竟为我们把握十力先生的立志以及一生中诸多“直凑单微”的授学讲记和语录提供了纲要。^{〔2〕}如果我们不理解十力先生的立志，就很难把握

〔1〕“夫求圣人之道者，必有高尚之志。未有志趣卑污，而可闻大道也。故学问有基本焉，立志是也。”（《读经示要》卷二，《全集》卷三，页694）

〔2〕十力思想立于《新唯识论》（文言本1932，语体本1944）和《读经示要》（1945），以后的讲记、语要和撰述，多反复申说这两部讲记的观点。《熊十力全集》卷帙虽多，重言亦多——《全集》卷五比其他各卷更为全面、集中地反映了十力的思想：《十力语要初续》中，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”一则篇幅最长（页64—186），义女熊仲光所记《困学记》（页223—287）次之，与1950年刊印的弟子所记《摧惑显宗记》相同，无不反复申

他的思想意图：为什么他要做学问以及为什么他要如此做学问，或者说他为何以及如何以回归儒经为学。由于十力先生的这封长函以“论六经”为题，为何和如何为学就具体化为为何以及如何阅读我国古传经典。

不少人可能会悲叹自己生不逢时，十力先生有幸不会生发如此悲叹，因为他的立志贵志适逢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伟大变革时机——《十力语要初续》首则“谈《易》”，我们一开始读到的是十力对自己一生学术的精炼概括，生逢其时的自我感觉让我们感铭至深：

吾少误革命，未尝学问。三十左右，感世变益剧，哀思人类，乃复深穷万化之原，默识生人之性，究观万物之变，盖常博考华梵先哲玄文而一归於己之所实参冥会，虽复学无常师，而大旨卒与儒家为近。余平生学在《新论》（引按：指《新唯识论》），推原《大易》，陶甄百氏，所以挽耽空溺寂之颓流者，用意尤深也。（《十力语要初续》，页4）

（接上页）论《新唯识论》。《论六经》实为《读经示要》的概要和接续：《读经示要》论六经至《周礼》时“无暇发挥”，《论六经》则说《周礼》最详。《韩非子评论》、《与友人论张江陵》显得特别，其实仍可视作《读经示要》第二讲之发皇，两者均在此讲中有所提及。

可以看到，从一位普通革命者脱胎而成就为一超凡大哲是十力的人生缘分——十力并非生性爱好“深穷万化之原，默识生人之性”的形而上学，走上形而上学之路是出于“感世变益剧，哀思人类”。所谓“世变”具体指中国由两千多年帝制回归共和的历史巨变，正因为如此，深入儒佛两家形而上学之后，十力再返回“世变”之局，以自己的学述力挽“耽空溺寂之颓流”。可以说，经过形而上学的“一归於己之所实参冥会”，十力才得以从一位普通革命者脱胎为伟大的革命家：从拿枪的革命人成为思想的革命家。所谓“少误革命”，十力自指早年投身辛亥革命的经历，但意思并非投身共和革命错了，而是有些许后悔延误了更为根本的革命事业——学问的革命。

熊十力生于1885年，父亲中过秀才，为乡下私塾先生。十力长到十岁时，父亲本来已经因病辍教，当他看出排行老三的子真（熊十力原名熊继智，字子真，“十力”之名为后来蔡元培所赠）“眼神特异”，便强支病体为子授学。^{〔1〕}熊子真读书果然非凡，长进很快，不幸的是，父亲不久病逝……子真天生有读书之才和向学大志，虽因家

〔1〕 熊十力生平见《全集》附卷下册中的岛田虔次文（页949—958）及诸回忆文（页1403—1574），任继愈、王元化、翟志成、郭齐勇诸文尤其值得一读。

道转贫寒不得不务农，却立誓“敬承大人志事，不敢废学”——在随后的日子里，少年子真追随兄长“带书田畔，抽暇便读”（《全集》附卷，页950）。这时，大城市已经有人在传播新知识和革命思想，与少年毛泽东一样，虽然身在乡下，熊子真仍然可以从乡贤自城里购回的种种新书中读到《格致启蒙》一类科普读物和“当时维新派论文”。在这些启蒙读物影响下，年仅十六七岁（1902年）的熊子真决志放弃应考科举，“以革命从戎，狂野不学”，投身满清新军武昌凯字营，“成为一小卒”。^{〔1〕}1906年，熊子真加入秘密革命团体日知会，与革命同志一起在军中秘密组织“黄冈军学界讲习社”，密谋兵变，未料遭清廷破获，旋受通缉。熊子真东躲西藏，避过风头回乡躬耕……五年半后，武昌兵变，熊子真闻讯从乡下赶到武昌，即赴前线投入战斗。革命成功之后，熊子真并没有想起早前的“敬承大人志事”之心，共和之初的混乱时局让他无从重拾问学之心——随后的帝制复辟迫使熊子真继续革命：护法战争爆发后，熊子真再次赶赴前线投入民军，增援与段祺瑞指挥的共和国军队交战的桂军，不久又转回广州，在孙中

〔1〕 参见《十力语要》卷三“尊闻录”附录（《全集》卷四，页542）。

山大元帅府任参谋。

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参谋仅半年，熊子真突然脱下军装离开革命队伍，时年三十五岁……十力先生后来多次提到自己这一人生转折的成因：

居半年，所感万端，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功夫者，如何拨乱反正？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，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，实未发真心，未有真志，私欲潜伏，多不堪问，赖天之诱，忽尔发觉，无限惭愧。又自察非事功之材，不足领人，又何可妄随人转！於是始决学术一途，时年已三十五矣……（转引自《全集·附卷》下册，页952；亦参《十力语要初续》，页216）

熊子真的觉悟始于对共和革命的反省：“吾党人”指有具体政治主张的共和革命者，共和革命难以成功，关键在于“党人”心力不正，私欲太多，争权夺利。^{〔1〕}

〔1〕 十力在发表于1934年《独立评论》上的《英雄造时势》一文中说，“到了辛亥武昌起义，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，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，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。”（《全集》卷八，页73）

熊子真自己就是革命党人，反省必然得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：他发觉自己的“真心”和天生禀赋都不在打仗，而在问学。熊子真脱离革命队伍不是背叛共和革命，更非要反对共和革命，而是对共和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：如果共和革命“党人”没有在“身心上作功夫”，革命最终难以成功，即便夺取政权，也缺乏建立新制度的精神根柢。经此觉悟洗心革面，熊子真才成为熊十力——从此他踏上了长达十余年的“默识”之路。注重在“身心上作功夫”是儒家心学的著名规矩，我们知道，儒家心学讲究身心功夫并非仅仅为了道问学，而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事功。熊子真离开革命队伍，是因为他看到，共和革命需要形而上学的或心学的支撑。十力后来深玩比量、推原《大易》、陶甄百氏，为的是用自己的学问“挽耽空溺寂之颓”，为共和革命提供精神基础。^[1]十力后来说，“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，其立论足开学派者，必其思想於形而上学有根据，否则为浅薄之论，无传世久远价值。”（《韩非子评论》，页306）——十力所谓的

[1] 熊十力晚年自述道：“余伤清季革命失败，又自度非事功之材，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，欲明了过去群俗，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前。故余研古学，用心深细，不敢苟且。”（《乾坤衍》，卷上，《全集》卷七，页344）

“政治哲学”指的是具体的政治主张，比如共和革命。心学或某种形而上学与具体的“党人”政治理想的结合，是熊子真走向学问的起点。这位共和革命“党人”作出的重大人生抉择是：首先寻找本心、发明“真心”。就在这一年，十力写下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部书，题为《熊子真心书》（1918，蔡元培序）。

按照孔子的教诲，问学不是为了过纯粹的静观生活，而是为了学会深切理解人世，习得在世言行的审慎德性——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不用说，要真正学成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非常非常难，“宁武子邦有道则知[智]，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如果这“愚不可及”堪称原始儒家“知行合一”的难及之境，^{〔1〕}那么，自有阳明

〔1〕 宁武子为卫国大夫，先后仕文公、成公两君。“文公有道，而武子无事可见，此其知之可及也。成公无道，至于失国，而武子周旋其间，尽心竭力，不避艰险。凡其所处，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，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，此其愚之不可及也”（简朝亮，《论语集注补正述疏》，唐明贵、赵友林校注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）。宋翔凤《论语发微》谓，宁武子之“知”，见于《左传》所记“遭罹国难，尽忠竭谋……若论其愚，当非有言可纪、有事可载也。……盖成公之无道，不在失国，在不知人……从容大国之间，周旋暗君之侧，潜诉皆绝，刑罚不罹，斯其能愚之，实足以脱乎乱世，非有圣贤之学，乌能

心学以来，“知行合一”德性观的品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：为学的事功取向取代了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。十力一再强调，治学若与经世分离，学问再好也不能开启“德慧”，反倒使人失去为学之本——“经世”固然并不直接等于搞共和革命，但对十力来说，搞共和革命才是真正的“经世”。为了共和革命而问学，是熊十力在二十世纪中国世变的历史境遇中所获得的独特际遇。明确了为什么做学问，也就决定了如何做学问：十力服膺心学，唾弃考据之学，正因为考据无济于当下的共和革命——的确，在革命时代治考据之学，本身就可能被视为反革命心态的表现：王国维捡起了革命家章太炎所抛弃的本行，最终结局众所周知。

“推原《大易》，陶甄百氏”是十力对自己一生学术既准确又精炼的自我概括。所谓“推原《大易》”指深入探究《易》中的心性形而上学义理，在此基础上，十力才有了“陶甄百氏”的气魄。“陶甄”的本来含义是把泥土化育、陶制成精美陶器，古人有“林富桂桧，土宜陶

（接上页）及于此乎？”（引自刘宝楠，《论语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90，页197—198）。若国君之无道“不在失国，在不知人”，则君子之智与愚皆与知人相关——“知人”乃圣贤之学要务，亦为圣贤之学最难之事。

甄”（刘禹锡）句。^{〔1〕}所谓“百氏”，既可能指诸子百家，也可能指庶众百姓——若谓前者，从辛亥革命老兵成就为心性形而上学家以后，十力所立之志便是化育“中国固有文化”，诸子百家成了这位陶人手中的泥土——倘若如此，十力要化育的泥土不仅是“百氏”，也是且首先是孔子所作六经。若谓后者，十力凭靠心性形而上学所立之志便是要当治天下的圣王。古人云：“昔者尧之治天下也，犹埴之在埴也，唯陶之所以为；犹金之在垆，冶之所以铸。”（《管子·任法》）……“故胜民之本在制民，若冶于金，陶于土也。”（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）唯一没有可能的是陶甄自己——“莫遭洪炉旷真宰，九流人物待陶甄”（唐代诗人薛逢句），谁一旦成就为心性形而上学家，就不再是需要被陶甄的九流中人。

十力会把“中国固有文化”或中国的万众百姓这把泥土陶制成怎样一具精美陶器，以及他如何陶甄这把泥土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都是非常值得回味的思想史问题。

〔1〕 参见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中的“陶甄”条。

一 走向新共和

1949年新共和成立之时，戊午之悟三十年后的熊十力已经成就为一代宗师。1948年秋季，当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决中原时，时在杭州浙大的熊十力经上海南下广州，由广东大弟子黄氏接待，被安置在番禺化龙乡私宅观海楼，观望国共对决。一年后，解放军兵临广州，与当时不少读书人一样，此时熊十力面临一个重大抉择：是否认同新生的共和国——如果不认同，经罗湖去香港，近在咫尺。十力先生的一些好友和得意弟子（钱穆、徐复观、唐君毅、牟宗三）要么决意去台、要么决意留港，总之不认同新共和。时已年近六十五岁的十力先生不忍离开大陆，致函弟子徐复观，问有否可能到南

京的中央大学教书，不然的话，留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书也行——十力先生看得很清楚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土壤在大陆，不可能有什么流亡离岛或割地的中国哲学。坚决反共的弟子徐复观觉得，尊师的政治意识糊涂得简直不可救药，回函以挖苦口吻让尊师写信“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”（《全集》附卷，页1607）。十力没有致函毛泽东先生，但解放军进驻广州仅十天左右，他就收到董必武、郭沫若自北京发来电报，“欢迎”他回北京——电报由广州军管会主席叶剑英派人送达中山大学。十力与董必武和郭沫若都谈不上至交，虽与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有过“革命之交”，但十力脱离国民党踏上形而上学之途时，董必武也脱离国民党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，此后两人再无交往；至于郭沫若，仅在抗战期间拜访过同在陪都的熊十力两次——拜访时除了带去十力爱吃的土鸡，还带去了周恩来先生的问候。十力先生接到辗转而至的电函后随即回函：若北归希望能在北大哲学系执教。北京方面很快给了肯定回复，十力当即决定接受邀请，他在致函竭力劝阻的弟子唐君毅时表达了自己的哲人心志：

吾年已高，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二字而丧尽

平生之所守？吾中国人也。中共既已统一中国，如不容吾侪教书，祇可作夷、齐。如尚容吾侪教书，则吾侪无有“自经沟壑”而不去教书之理。（转引自《全集》附卷，下册，页 1611）

十力并非因为年事已高不愿去香港，只要新政权愿意给他一席之地教书，他就愿意北归，实际还有更为深层的心愿，如他后来在致新共和领导人的信中所言，自己虽然对“学术思想确曾用过苦功，非以广闻见为务，非欲以学问家自鸣”（《论六经》，页 771），而是思考中国两千多年深陷“帝制颓运”与中国固有思想的关系。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分裂，国不成体，作为辛亥革命老兵，十力始料未及，更非革命初衷。在十力先生眼里，辛亥革命尚未成功。革命不仅意味着推翻旧制度，更重要的是建立新制度。孙文发起二次革命失败后，袁世凯在美国传教士怂恿下企图改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，尽管君主立宪属于现代政体，袁氏的企图难免被视为皇权复辟，自然会引发挥卫共和政体的护国军起义。从此，中国逐渐走向军阀割据，国家分裂迄今没有了结，即便在联合抗日时期，中国的内战也没有结束。共和政体的立国都尚未真正实现，辛亥革命何以